

国外共产党人看中共百年

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谛

口 尤哈-佩卡·瓦伊萨宁



尤哈-佩卡·瓦伊萨宁 芬兰共产党主席 卢重光绘

从芬兰共产党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阶级斗争以及人民民主的全球性发展。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重大事

件,比如全世界很多共产主义政党的建立——包括具有红船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

我们芬兰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使工人阶级和贫苦群众受益良多。

从经验来看,在各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艰难甚至错误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风险之一是把自己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在未来,与具有不同国家体制和不同政策的国家建立联系并实现互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芬兰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倡议。由此,可以在和平、参与和宽容的基础上开启全球性的政治对话。

未来人类社会变革的前景

非常广阔,我们不是在独自改变未来和世界,而是和所有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们一起前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意识。未来属于那些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发挥潜力并参与其中的进步的人们。

此外,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政党和公民个体中总有一些旁观者,他们不是变革的推动者和未来的建设者。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股势力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障碍。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和芬兰面临的共同挑战就在于推动人们认识自己的定位,认识自己在形成集体观念、进行集体建设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发挥他们的潜力并参与进来。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和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我认为,无论是对于重大问题的开放性对话还是建设社会主义

的具体举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现存最为重要的传统资源之一。年轻人能够不断从中获得精神激励。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数量激增,因为大家都已看到资本主义如何导致了环境危机以及不公正的财富分配。

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令人高兴的是社会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研讨马克思主义不再仅仅是学院派的专利。

在我看来,通过国家的开放和政治对话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成功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我认为中国是构建更美好未来的进步力量中的一员。

芬兰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友好的历史,并且对两者有共同的期待。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如下这样一些方面加强斗争,比如:参与式民主、女权平等、基本安全、劳动分工与加班

工时、消除环境危机、建设正义与可持续的和平等等。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令人鼓舞,因为这一倡议是立足于全球性和包容性视野而提出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将世界各国政党联结在一起。基于为所有人构建一个更美好未来,实现正义、持续和平与基本安全的目标,这一倡议必然是包容性的,必然是建立在全国政党和公民组织等行为主体的公开、宽容的对话之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统筹。译者贾可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国人权外交的「照妖镜」

口 丁隆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举起所谓人权外交的旗帜,多次声称“人权将回归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地位”,对中东国家的人权状况表现出比上届政府更多的关切。对此,中东国家舆论反应冷淡,多有质疑与批评。

美国在中东的人权外交受此冷落毫不意外。探究中东人权状况恶化的根源,美国难辞其咎。美国就是一些中东国家人权状况恶化的罪魁祸首,伊拉克等国的人道灾难系美国一手造成。对于巴勒斯坦、也门等国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则助纣为虐,扮演了帮凶角色。从动机看,在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重推以人权、民主化为抓手的价值观外交,并非出于对中东人权状况的真实关切,而是把人权作为维持对中东控制力的手段,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一己私利。同时,近年来美国国内种族主义沉渣泛起,人权状况不断恶化,自称“人权旗手”的美国已丧失了公信力,其人权“卫士”和“教师爷”的身份广受质疑。美国人权捍卫者的遮羞布被扯下,其人权旗手的本来面目已暴露无遗。

人权惨状的制造者

观察美国的中东人权外交,不能就其自由、民主、人权等花言巧语迷惑,而要看在中东的所作所为。“9·11”事件后,美国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提出要用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改造中东,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且不说美国的中东战略找错了症结,开错了药方,即使在方法层面也充满悖论。美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大规模战争揭幕,使两国生灵涂炭,沦为人间炼狱。近20年的战火已夺去近50万阿富汗平民和近70万阿富汗士兵的生命,还迫使270万阿富汗人逃亡海外,40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而阿富汗总人口也不过3600万。在阿富汗局势依旧动荡、政府立足未稳之时,美国却卸包袱,不负责对阿富汗撤军,必将酿成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凭借于虐乌有的借口,绕过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将伊拉克沦为世界人权重灾区,至今百姓仍难享基本安全。截至2011年美国撤军,已有超过10万伊拉克平民丧生,280万人流离海外,200万人流离失所。这场以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使伊拉克成为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暴力、最腐败、最专制、最野蛮的国家之一,沦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渊薮,自杀式爆炸此起彼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度控制伊拉克大片领土,战争和暴乱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犯下的人权罪行更是罄竹难书。美军士兵在阿布格莱布“黑狱”疯狂虐囚的大量照片流出,美国在伊拉克推广民主、人权的人道底线彻底崩塌。

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与之相伴的是肆意践踏人权。美国在关塔那摩设立监狱,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违反司法程序长期拘押大批人员,其中包括许多与恐怖主义无关的平民。美国不顾基本人权,在全球范围跟踪、监视、监听穆斯林,甚至颁布针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禁穆令”,剥夺他们的旅行自由。在反恐行动中,虐杀、虐囚比比皆是,令许多无辜者蒙冤,甚至丧命。

美国对伊朗等中东国家实施“极限施压”的严厉制裁,甚至食品、药品等必需品都不能被豁免,扼杀生命的抗疫物资和设备都在禁运之列。美国指责这些国家侵犯人权,殊不知其实施的制裁导致范围更大、程度更严重的人权灾难。

人权“双标”暴露伪善

美国选择性对待中东人权问题,对人权标准因人而异,不合则弃,对敌手的人权问题拿着放大镜看,对自己的人权问题选择性失明,甚至明火执仗地为其撑腰。美国在中东人权问题上的“双标”嘴脸,充分暴露其人权外交的虚伪性。

美国长期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纵容其侵害巴勒斯坦人民基本人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封锁和制裁,使其沦为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人权状况极其悲惨。在数次加沙冲突中,又有23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上千人受伤。在美国百般阻挠下,联合国安理会甚至未能就此冲突发表任何声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修建定居点,兼并巴勒斯坦土地,众多巴勒斯坦人因此失去家园和土地。美国一贯袒护以色列非法定居行

为,曾30多次在安理会否决谴责以方修建定居点的决议,特别将政府更迭公开宣布定居点合法。

也门战争已持续6年有余,酿成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已有20多万死于战争。在也门2700多万人口中,2400万人依赖人道援助勉强维持生存,1600多万人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半数以上的婴幼儿营养不良。美国对也门人道危机坐视不管,继续向有关国家出售武器,成为也门人道危机的共谋者。

人权是美国称霸中东的工具

美国中东人权外交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是中东人权状况从不是其真正关切,它只不过是服务其中东战略的一根障眼石。在保护人权的美国宣言下,人权被政治化、工具化。美国中东人权外交并非线性发展,与不同党派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并不随人权状况变化而调整,也未基于一以贯之的人权标准。随着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涉逐渐退场,人权外交便适时登场,企图在直接控制力下降时,起人权“紧箍咒”,用价值观外交维持影响力。即使同一届政府,对待相似的中东人权问题采取的政策也可能不同甚至相反,充分说明美国人权外交的工具性。因此,美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东人权状况,美国关心的只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美国中东人权外交的另一误区是漠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未将发展作为解决人权问题的出路。中东国家长期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居于末位,许多国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中东人权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滞后,解决中东人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美国对中东发展漠不关心,对其发展援助逐年下降,承诺的援助也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几十年来几乎没有搞过像样的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如此人权外交,对中东国家的民生福祉毫无裨益,无异于缘木求鱼。

美国中东人权外交基于一个危险的逻辑,即将自己视为“民主灯塔”“人权高地”,中东则是“未开化”的“人权洼地”,需要美国去启蒙、教化。这种充满道德优越感、居高临下的姿态,暗合其他文明的偏见与歧视,必然遭到有关国家反感和抗拒。同时,它无视人权发展的历史。人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超越历史阶段孤立地看待人权,自然得不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解。

近代以来,中东多灾多难,民生涂炭,人权状况不容言。美国对此难辞其咎。连篇累牍之后,美国重提中东人权外交,目的在于用人权作工具,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然而,美国若连中东的人权记录,对中东人权问题的双重标准,充分显示其中东人权外交的伪善,决定了美国的这次尝试与以往的人权外交一样,难逃失败的下场。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突尼斯单日新冠死亡人数创新高。图为7月24日,人们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外等待接种疫苗。

▲马来西亚卫生部7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中午12时,过去24小时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045例,连续三天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013438例。图为25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凯里岛的居民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中国通”谢伟思的风雨人生

口 刘宋涛

二十世纪初的成都街头,人们时常能看到一个长脸蛋、大眼睛、天真活泼的外国男孩操着一口成都腔与行人交谈。那时,这个孩子还不知道,在命运的安排中,他一生的荣辱毁誉都将和这个国家密切相关。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1909年8月3日出生在成都市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2岁时随父母回到美国。大学毕业后,谢伟思立志外交事业,于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考试成为外交官,之后返回出生地中国任职于美国驻北平和上海总领馆,结识了包括埃德加·斯诺在内的许多进步的中外学者和新闻界人士。

谢伟思真正的事业是从抗战期间的重庆开始的。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回忆说:“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尽可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有外国记者,有中国记者,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也有共产党驻重庆的领导人员。他多次走访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周恩来曾邀请他到家中叙谈,用餐,他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一样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在重庆,谢伟思对中国的社会进一步深入了解,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逐渐失去信心,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由衷

钦佩。

1944年7月,美军派遣由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又名“迪克西使团”飞赴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首次官方接触。“迪克西使团”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各州的称呼。谢伟思被委任为“迪克西使团”的政治顾问。

在延安期间,谢伟思得以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

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陈毅因少年时曾在成都谢伟思父亲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从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由衷

进行广泛接触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是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韧的领导素质。”“将他们排列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团体之上都是不足为奇的。”

在向美国政府发去的电报中,谢伟思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东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正确的。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国民党的领导政治上盲目,完全自私,只关心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3月8日,谢伟思第二次来到延安,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多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总有一天美国会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还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谢伟思。谢伟思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了重庆和华盛顿。

1945年4月1日下午,谢伟思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彻夜长谈,周恩来和朱德在场,董必武后来也加入。这是他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他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的联系。

不想风云突变,1945年4月,谢伟思返回美国后即遭逮捕,并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成为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国务卿艾奇逊迅速将他开除。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认为逮捕谢伟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标志,并声明“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的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应有的教训”。

直到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才作出对谢伟思的无罪判决。同年9月,谢伟思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但已不受重用,后被派往德国被遣,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美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受到各种排挤,三年任满后谢伟思决定提前退休。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政府邀请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工作的费正清,

谢伟思等人,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问题的见解。谢伟思发言说:“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让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

1971年10月,谢伟思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1973年1月,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了盛大的午餐会,专门宴请20世纪40年代在华的外交官。《纽约时报》为这次午餐会发表的社论说:“这实际上是‘老中国通们’平反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些‘老中国通们’的前程之所以被断送或被玷污,都只因为他们准确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战胜蒋介石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1998年5月,谢伟思接受中国学者采访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我出生在中国,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999年2月,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终年90岁,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